

对外开放新局面下的中国国家形象构建

——来自“一带一路”倡议的经验研究

宋 弘 罗长远 栗雅欣^{*}

摘要 本文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主要发现：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等；另一方面，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对欧洲与中亚地区公民的评价有正面影响，却降低了部分低收入国家，以及南亚国家公民的评价，影响机制可能来自海外媒体宣传导致的误解和担忧。本文的结论为更好地建设“一带一路”，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形象提升的双赢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对外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国家形象

DOI: 10.13821/j.cnki.ceq.2021.01.12

一、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经过多年持续高速增长，正在实现从引进来到引进来和走出去并重的重大转变，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目的也从以往单一的通过“卖产品”实现经济收益提高到了参与未来世界经济构建、提升国家形象、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多元化的目标。在此背景下，“一带一路”倡议正是集政治、经济、外交为一体的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党和国家已经将“一带一路”提升至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九大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修正案）》的决议将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等内容写入党章。“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更是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其设计初衷之一在于提升我国对外开放的水平和国际形象，为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再添活力，并促进国际和平与发展。

中国的国际形象一直以来是备受关注且争议众多的话题。2017 年开展的

^{*} 宋弘，复旦大学经济学院，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罗长远，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上海国际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栗雅欣，法国图卢兹经济学院。通信作者及地址：罗长远，上海市国权路 600 号复旦大学经济学院，200433；电话：(021) 65643708；E-mail：chyluo@fudan.edu.cn。作者感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1803027, 71873037)、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13JJD790004、16JJD790010)、上海市浦江人才计划(18PJC012)对本文的支持。当然，文责自负。

一项全球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中国的整体印象和评价在不同国家与群体间分化较大。与 20 世纪初相比，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对外开放的日益推进，一些国家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所增长。例如印度民众对中国形象的负面评价增长了 25%，达到了 60%，积极评价也减少了 14%；而与此同时，在印度尼西亚，公众对中国的负面评价达到了 50%，超过正面评价比例（28%）。如何在对外开放新局面下，有效地构建与提升国家形象，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形象提升的双赢，是一个重要且亟待得到回答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大国形象可能具有双重的影响。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将进一步加强我国与沿线国家的合作与交流，能够把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同沿线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促进沿线各国在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结构调整等多个方面互通有无、优势互补，搭乘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实现合作共赢，提高沿线国家民生福祉，最终提高我国的大国形象。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也会带来不少担忧，在部分国家地区政府以及海外部分媒体带有目的、不符事实的渲染与宣传下，不少沿线国家，尤其是教育水平较为低下的个体，容易错误地将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对外投资援助视为一种对其自身的冲击与威胁，使其本国的影响力和国际地位相对下降，由此，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沿线国家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误解与担忧可能又会降低我国的国家形象。

那么，“一带一路”倡议究竟如何影响着中国的国际形象呢？这也是本文关注的话题。具体而言，本文利用 2005—2015 年全球价值观调查数据，通过构建国家与时间层面的双重差分解决内生性问题，来尝试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家形象构建的影响。特别的，本文试图回答如下几个关键但目前尚未得到很好回答的问题：“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有怎样的影响？其背后的影响机制是什么？“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大国形象的影响具有怎样的异质性？通过对这些问题的系统回答，为新时代下，如何更好地实现对外开放、经济发展与国家形象提升的双赢提供有益的启示。

本文接下来的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梳理和评述相关文献，在此基础上引出本文研究的创新之处；第三部分是实证方法与所使用数据的说明；第四部分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及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第五部分考察其影响机制以及影响的异质性；第六部分为结论性评述。

二、相关文献评述

随着中国与世界经济融合的不断加深，对外开放与贸易自由化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评估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大多数研究强

调贸易对于工业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比如企业生产率（余森杰，2010）、企业出口参与和出口强度（田巍和余森杰，2013；毛其淋和盛斌，2013、2014）、进口中间品质量（余森杰和李乐融，2016）、企业加成率（罗长远等，2015；余森杰和袁东，2016）、企业研发投入（田巍和余森杰，2014）、融资约束等（罗长远和李姝醒，2014）。也有研究着眼于贸易自由化对于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大多着眼于劳动收入份额（白重恩和钱震杰，2010；余森杰和梁中华，2014）、劳动需求弹性（盛斌和牛蕊，2009）、消费者福利（魏浩和付天，2016），就业、工资与收入不平等（魏浩和赵春明，2012；张川川，2015b），以及人力资本与教育的维度（张川川，2015a；Li et al.，2018）。然而，关注中国的对外贸易对中国大国形象影响的文献则比较少，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考察此问题的研究则更少。

另一方面，经过四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中国已经一跃成为经济总量第二、外贸总额第一的大国。随着中国对外贸易及经济总量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文献考察了中国贸易出口对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现有文献大多以美国为背景，例如，有文献发现中国对外贸易增加了美国制造业的失业率（Acemoglu et al.，2016；Pierce and Schott，2016a），损害了美国的公共健康（Autor et al.，2016；Pierce and Schott，2016b）。已有研究大多关注美国或欧洲经济体，而较少有研究关注对外贸易对于中国周边沿线国家的影响。此外，以上研究大多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背景，侧重考察的时间段也以2010年以前为主，尚未有研究将考察的维度拓展到以“一带一路”倡议为重要特征之一的对外贸易新时期。

国家形象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关系具有重要的影响（Zhi et al.，2017）。已有文献探讨了对外援助、债务减免等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孔志国，2017；Chang et al.，2017）。我们注意到，已有的研究大多提供描述性的证据（王珏，2007；徐旭伟，2016），少数提供实证证据的研究，也尚未考虑可能的内生性问题。此外，已有研究大多侧重以资金支持为主的对外援助措施（孔志国，2017；Chang et al.，2017）。也有文献讨论了影响国家形象的可能机制，大多来自国际政治或媒体观察的视角，较少有严谨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现有文献基础上，主要有以下三点创新与突破：第一，中国对外贸易对国内经济社会的影响评估早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大多数研究强调贸易对于工业企业和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少有研究强调贸易对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影响。国家形象作为一种重要的“软实力”，能够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效益。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考察对外开放的影响，有助于更深入全面地理解贸易自由化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第

二，越来越多的文献考察了中国贸易出口对于其他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而现有文献大多以美国为背景，且大多侧重于 2010 年以前贸易自由化的影响。“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现实要求下，对构建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格局和包容性发展的国际合作模式的新探索，考察其对于中国周边沿线国家的影响，为已有文献做出了维度与时间上的拓展。第三，国家形象的构建和提升是公共外交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已有关于国家形象构建的文献大多基于描述性的研究，利用实证计量模型对其进行严谨定量分析的文献较少，而在解决内生性问题基础上，考察其因果关系的文献则更少。本文利用“一带一路”倡议在国家和时间层面构建双重差分，考察了“一带一路”对于中国大国形象构建的影响，填补了已有文献的空缺。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说明

(一) 数据来源与数据描述

本文的目的是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为此，本文综合采用了包括国家形象变量的 PEW Research Center 数据库与包含国家特征的世界发展指数（WDI）数据库。具体而言，本文主要变量“国家形象”的数据来自 PEW Research Center，这一机构自 2002 年起，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一项名为 Global Attitudes & Trends 的问卷调查，调查内容涵盖各国民众对自身生存发展状况以及对当下重要国际问题的看法，调查每年从每个国家选取 1 000 个左右的样本，受访者限定为 18 岁以上的自由平民。为了保证抽样的代表性，问卷的取样方式为分层抽样，先从地区开始，层层抽样至街区，再随机选取地址或者遵循随机游走的方式选取住户。¹

截至 2015 年，包括中国在内，共覆盖 60 个国家，其中属于“一带一路”政策名单上的国家共有 28 个。²本文主要采用“对中国的印象”这一问题的数据作为衡量中国国家形象的指标，这一直是该项调查的核心问题之一，受访者被要求在“印象非常正面”“比较正面”“比较负面”和“非常负面”四个选项中选择一项。为了方便系数的解释，本文将该问题的回答进行标准化处理。³此外，调查在 2006 年开始陆续加入更多关于中国国家形象的问题，包括

¹ 问卷调查每年在各国同步工作，时长约为 3 到 6 周，以减少调查期间发生重大事件对调查的影响，误差控制在 5% 以下。采访形式包括电话采访和实地采访，为了保证调查的精确性，问卷被翻译成全球 80 多种语言。

² 由于少量国家相关结果与特征变量的缺失，在本文的回归分析中，共包括了 57 个国家的样本。

³ 标准化处理后，该变量的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

“中国是否会是未来全球经济的领跑者”“中国飞速的经济增长是否是一件好事”以及“中国是伙伴还是敌人”等。本文同时也将这些问题纳入，作为机制考察的补充指标。⁴除了国家形象相关的问题，PEW还包含一系列完整度较高的受访者个人层面的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职业、收入等。

除此之外，本文基于世界发展指数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简称 WDI）获得一系列国家层面的特征变量，用于机制考察以及国家控制变量。WDI 数据库包含了丰富的国家层面的面板数据变量，如经济总量、人均生产总值、军事支出占比等。表 1 描述了相关变量的统计结果。观察表 1 的均值和标准差，不难发现，不同国家民众对于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具有较大的差异。

表 1 数据描述性统计

统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被解释变量：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标准化）	0	1	299 588
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原始值）	2.91	0.89	299 588
被解释变量分类（标准化）			
沿线国家，2012 年及之前	0.14	1.00	92 447
沿线国家，2013 年及之后	0.07	0.99	50 558
非沿线国家，2012 年及之前	-0.21	0.99	94 537
非沿线国家，2013 年及之后	0.02	0.99	55 252
解释变量			
OBOR × Post_2013	0.17	0.38	292 794
OBOR	0.49	0.50	292 794
Post_2013	0.36	0.48	292 794
控制变量			
国家总储备金（对数化）	25.20	1.83	292 794
人均 GDP（对数化）	8.81	1.34	292 794

⁴ 这项调查从 2002 年起经历两次问卷设计、调查方法上的重大调整，自 2006 年开始重新设计问卷，在中国话题下面补充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自 2013 年开始又精简了部分重复问题。幸运的是，其中“对中国的国家印象”这个问题一直相对稳定，只有 2003 年和 2004 年两年由于聚焦伊战问题而没有出现在调查中。

(续表)

统计变量	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军事支出占比 (百分数)	2.24	1.30	292 794
性别 (女性)	0.50	0.50	292 794
年龄	40.73	15.91	292 794

注：被解释变量与个体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 PEW 数据库；国家控制变量数据来源于世界发展指
数数据库（WDI）。

(二) 实证模型：双重差分法

本文依托 2005—2015 年跨度为 11 年的数据，利用“一带一路”倡议这一自然实验，构建国家与时间层面的双重差分，在缓解内生性问题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具体而言，本文构建如下双重差分模型：

$$Y_{ict} = \alpha + \beta OBOR_c \times Post_{2013} + W'_{ict}\delta + X'_{ct}\varphi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其中， Y_{ict} 表示属于国家 c 的个体 i 在年份 t 对于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评价共有四个选项，分别为：4. 非常正面；3. 比较正面；2. 比较负面；1. 非常负面。为了更好地解释估计结果，我们将回答标准化（使得其均值为 0，标准差为 1）⁵。 $OBOR$ 为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虚拟变量 ($OBOR_c = 1$ 表示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之为 0)； $Post_{2013}$ 为时间的虚拟变量，由于“一带一路”倡议于 2013 年正式启动， $Post_{2013} = 1$ 表示 2013 年及之后的年份， $Post_{2013} = 0$ 反之。 W_{ict} 为个人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与年龄； X'_{ct} 表示国家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国家总储备（对数化）、人均生产总值（对数化）、军事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 η_c 为国家固定效应，控制了所有国家层面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对结果估计的影响； λ_t 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了时间层面的冲击，比如宏观经济形势的变化、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等。

我们关注的核心系数是 β ，其度量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程度。双重差分法作为类似自然实验的一种，其最理想的情况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是随机选择的。然而在现实中，国家与政策的选择显然不是随机的。对此，我们采用一系列的方法来证明这一实证方法是合理的。第一，我们利用事件分析法进行了平行趋势检验，应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之间具有相似的长期趋势，即在未提出“一带一路”

⁵ 这一标准化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解释和理解相关估计系数的大小，这也是相关文献中常用的方法，比如 Carrell *et al.* (2011), Fryer and Levitt (2010)。使用原始数据进行回归的结果也是类似的，限于篇幅，回归结果未在正文汇报，有需要的读者可向作者索要。

的情况下，这两组国家发展的趋势是大致一致的。第二，本文采用2010年的国家层面的特征数据，结合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选择标准，在时间维度上控制了国家间原有差异对于估计结果可能的影响。第三，本文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比如采用随机地分配“一带一路”名单作为安慰剂检验，剔除样本中地理位置较远的国家，以及进一步限制时间区间等，结果均是稳健的。具体检验方法与结果将在第四部分中报告。

四、实证结果

(一) 实证假设检验

应用双重差分法的前提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之间具有相似的长期趋势，即在未提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情况下，这两组国家发展的趋势是大致一致的。参照Gentzkow and Shapiro (2006)、Moser and Voena (2012)等的方法，我们首先利用如下事件分析法方程检验平行趋势，具体方程如下：

$$Y_{ict} = \alpha + \sum_{k=2010}^{k=2015} \beta_k \times OBOR_c \times Year_t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2)$$

在这一设定中，关键系数是 β_k ，其表示了在剔除国家与时间固定效应的因素后，实验组与控制组在时间趋势上的差别。图1描绘了事件分析法回归的系数对应的时间趋势图，虚线为根据系数描绘的趋势图，阴影部分为95%置信区间；不难发现，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的变化趋势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前（2013年之前）是非常平缓的，并没有发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但是，沿线国家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后的增长程度显著低于非沿线国家，表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其他国家对于中国的评价在“一带一路”倡议开始前并没有显著的差异，因此满足双重差分法的基本平行假设。

(二) 基准结果

表2报告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影响的双重差分估计结果。如式(1)所示，所有的回归均加入了国家固定效应与时间固定效应。第(1)列显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降低了其他国家对于中国形象的评价，其影响程度大约为17.1%个标准误。当模型中加入了个人控制变量（列(2)），与国家控制变量（列(3)）后，结果在经济与统计意义上依然均稳健，且系数大小也非常相似。为了进一步考察“一带一路”项目实施后的逐年影响，本文将“一带一路”时间虚拟变量拆分为参与后的第 k 年（其中 $k=1, 2, 3$ ），第(4)列的结果显示，三个年份变量均为负数，且注意到第一年的系数较小且在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而第二年与第三年的系数较大且均显著为

负，这也与项目逐年推进与深入的事实相符合。此外，观察控制变量的系数发现，人均GDP、总储备金率与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正相关，而军事支出与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负相关，这一估计结果也是符合经济学直觉的：较高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有助于公民更客观、乐观地评价中国大国崛起的事实；而较高的军事支出占比意味着更为敏感与不稳定的环境，将使得本国公民对于新兴发展的大国经济体的态度更为敏感与担忧。综上所述，相比非沿线国家，“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沿线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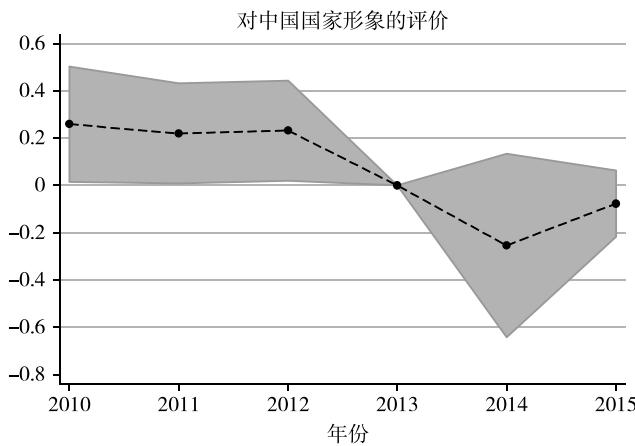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注：虚线描绘的是由式(2)回归得到的系数 β_k ，阴影部分描绘的是其对应的95%置信区间。

表2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国家形象：基准回归结果

	(1)	(2)	(3)	(4)
$OBOR \times Post_2013$	-0.171*** (0.008)	-0.171*** (0.008)	-0.181*** (0.008)	$OBOR \times Year2013$ -0.017 (0.011)
$OBOR \times Year2014$				-0.357*** (0.011)
$OBOR \times Year2015$				-0.171*** (0.011)
<i>Female</i>	0.034*** (0.003)	0.034*** (0.003)	<i>Female</i>	0.034*** (0.003)
<i>Age</i>	-0.001*** (0.000)	-0.001*** (0.000)	<i>Age</i>	-0.001*** (0.000)

(续表)

	(1)	(2)	(3)	(4)
<i>Reserve</i> (log)			0.053*** (0.008)	<i>Reserve</i> (log) (0.008)
<i>GDP_Per</i> (log)			0.040*** (0.011)	<i>GDP_Per</i> (log) (0.011)
<i>Military ratio</i> (log)			-0.019*** (0.007)	<i>Military ratio</i> (log) (0.00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个人控制变量	否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国家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国家控制变量
观测值	292 794	292 794	292 794	观测值
调整 R^2	0.191	0.191	0.192	调整 R^2
				0.193

注：*OBOR* 表示是否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虚拟变量（即： $OBOR=1$ ，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反之， $OBOR=0$ ，不属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Post_2013* 表示“一带一路”倡议开始的时间虚拟变量（即： $Post_2013=1$ 表示 2013 年及之后的年份；反之， $Post_2013=0$ 表示 2012 年及之前的年份），下同；个体控制变量包括性别与年龄，下同；国家控制变量包括国家总储备（对数化）、人均生产总值（对数化）、军事支出占总财政支出比重，下同。括号内为标准误；*、**、*** 分别表示在 10%、5%、1% 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三）稳健性检验

1. 加入基准变量缓解选择的影响

双重差分法作为类似自然实验的一种，其最理想的情况是，沿线国家与非沿线国家是随机选择的。然而在现实中，“一带一路”国家名单的选择显然不是随机的，与国家的地理位置⁶，国家原有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等因素密切相关，而这些原来的国家之间的差异，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对个人的价值观产生不同的影响，为了控制这些因素对结果估计的影响，采用 Edmonds *et al.* (2010) 和 Lu *et al.* (2017) 的方法，我们在回归中加入这些基准因素与时间线性趋势的交叉项，采用以下估计方程：

⁶ “一带一路”名单的确定与国家的地理位置密切相关。事实上，“一带一路”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主要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其名单也与古代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一定的重合。

$$Y_{ict} = \alpha + \beta OBOR_c \times Post_{2013} + Z'_{ic} \times trend_t + W'_{ict} \delta + X'_{it} \varphi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3)$$

其中, Z'_{ic} 包括了各国原有的地理位置、经济发展水平与开放程度。具体而言, 采用国家所属地理区域、2010 年的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程度的代理变量, 旅游收入占生产总值比重作为开放程度的代理变量。 $trend_t$ 代表时间线性趋势。因此, $Z'_{ic} \times trend_t$ 从线性的角度控制了国家原有特征对于其公民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影响,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由于实验组与控制组选择的不随机造成的估计偏差。其他变量均与式 (1) 一致。表 3 列 (1) 汇报了加入基准变量之后的估计结果, 发现交叉项系数依然显著为负, 表明考虑到原有的国家间差异可能的影响后, 估计结果依然稳健。

表 3 稳健性检验

加入基准选择 标准的影响	剔除美洲 样本	2010—2015 年区间	其他政策可能 的影响	加入宗教信仰与 对其国家的评价
(1)	(2)	(3)	(4)	(5)
$OBOR \times Post_2013$	-0.234*** (0.009)	-0.191*** (0.009)	-0.202*** (0.011)	-0.177*** (0.007)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22 933	250 136	175 629	292 794
调整 R^2	0.212	0.207	0.203	0.192
				0.189

2. 样本的选取

样本覆盖的国家包括了七个地区, 分别为: 中东与太平洋地区、欧洲与中亚地区、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中东与北非地区、北美地区、南亚地区, 以及非洲撒哈拉地区。我们注意到, 拉丁美洲与加勒比海地区、北美地区与中国距离较远, 与其他地区差异较大, 且并没有国家入选“一带一路”名单。为了避免这两个较为特殊的地区对于结果估计的影响, 我们剔除了这两个地区的样本, 采用五个地区的样本进行稳健性分析。表 3 列 (2) 汇报了回归结果, 结果依然在 1% 水平上显著为负, 且估计系数大小与表 2 较为相似, 表明估计的结果并未受到控制组地区选择的影响。

3. 时间区间的选择

本文主要分析的时间区间选择在2005—2015年间。在此时间区间内，除了“一带一路”倡议，还有一系列由其他宏观政策所带来的影响，比如四万亿投资计划、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2001年加入WTO所带来的关税逐年下降等。为此，本文进一步将研究区间局限在2010—2015年间，以缓解其他因素对结果估计造成的偏差。结果在表3列(3)中汇报，不难发现，主要估计系数仍然显著为负，且系数大小与表2的结果非常相似，表明主要估计结果并未受到时间区间选择的影响。

4. 来自其他政策的影响

此外，还有一个可能的担忧是，在此期间其他的国际政策或变化对估计结果的影响。⁷为此，我们首先搜集了2013年其他国家发生的事件，包括军事上中俄联合军演、美国连任总统奥巴马宣誓就职、朝鲜在北部地下核试验场进行了第三次核试验，以及埃及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等，进一步加入相关的政策变量与2013年前后时间虚拟变量的交叉项。⁸如表3列(4)所示，估计结果与基准估计非常相似，进一步从实证角度证明了这一结果并未受到其他政策的影响。

5. 对其他国家的态度与评价的影响

一个个体对中国的评价，可能与其宗教信仰有关，同时也受其对其他国家态度的影响，比如某个个体对美国的偏爱，也可能影响其对中国的态度，这些因素可能也会间接地影响其对中国的国家形象评价。为此，作者对此进行了相关的稳健性检验，如表3所示，列(5)加入了宗教信仰的控制变量，以及对其他国家评价的控制变量（包括对美国、欧盟、俄国、伊朗的国家形象评价）。⁹不难发现，在加入这些控制变量后（包括宗教信仰，以及对其他国家的形象评价），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⁷ 具体的，即使本文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也不能完全排除这些因素对于估计结果的影响，因为可能存在年份-时间层面的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换言之，这一问题本质是内生性问题，如果其他2013年发生的事情，受到影响的国家与“一带一路”国家名单具有较高的重合度，则可能影响结果的估计。通过相关政策细节查询，发现这些事件受影响的国家名单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的重合度较低，且大多只发生在一个或少数几个国家。

⁸ 具体的，相关政策变量包括“是否俄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中俄军演），“是否朝鲜虚拟变量”（用以控制朝鲜局势），“是否美国虚拟变量”（用以控制美国总统连任），“是否埃及虚拟变量”（用以控制埃及爆发的大规模示威游行）。此处感谢审稿专家的建议。

⁹ 具体来说，宗教的控制变量是9个维度的固定效应，包括佛教、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伊斯兰教、其他宗教、无宗教信仰、拒绝回答、不确定等。数据库中包括对美国、欧盟、俄国、伊朗、英国、日本等国家的形象评价，但是，由于并非每年都会调查对所有国家的形象评价，所以部分国家（比如日本、英国）的样本缺失较为严重；因此，作者选取了美国、欧盟、俄国、伊朗等国的国家形象评价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6. 安慰剂检验

最后，我们利用“一带一路”国家名单的随机分配进行了一个间接性的安慰剂检验。首先通过随机产生“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并利用式(1)进行回归，得到了一个错误的估计变量： $\hat{\beta}^{random}$ 。然后将此随机分配与回归过程重复500次，从而产生了500个 $\hat{\beta}^{random}$ 。¹⁰通过刻画 $\hat{\beta}^{random}$ 的分布图，我们发现， $\hat{\beta}^{random}$ 的确分布在零的附近且符合正态分布，表明我们的模型可以通过这一安慰剂检验。¹¹

五、机制考察与异质性分析

(一) 机制考察

以上研究结果稳健地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质量具有负面影响。那么，其影响的传导机制是什么呢？本部分将从两个角度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国家形象的传导机制。

1.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机制

首先，与众多国家对外投资项目类似，“一带一路”倡议可能通过影响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而直接影响该国公民对于中国的评价。具体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如果降低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影响了该国居民的生活水平，则会对中国形象有负面的影响。为验证这一机制，本文选择各个国家人均生产总值、国家就业率与入学率作为衡量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代理变量。表4报告了相关的双重差分回归结果，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了沿线国家的人均生产总值5.5%，就业率3.3%，入学率4.0%，以上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事实上显著大幅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因此，从经济社会发展角度分析，“一带一路”倡议应该提高沿线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从而得出结论，这一机制并不成立。

¹⁰ 这一检验的具体思想为：首先，我们根据式(1)可以得出系数 β 的表达式为：

$$\hat{\beta} = \beta + \gamma \times \frac{\text{cov}(OBOR_c \times Post_{2013}, \epsilon_{ict} | W)}{\text{var}(OBOR_c \times Post_{2013} | W)},$$

其中，W包括其他所有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如果 $\gamma=0$ ，则非观测因素不会影响到估计结果，即证明 β 是无偏的，但我们无法直接证明这一点。我们采用了间接检验的方法，如果找到一个错误的变量替代 $OBOR_c \times Post_{2013}$ ，这个错误变量理论上不会对结果变量产生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下， $\hat{\beta}$ 应该为零，如果 $\hat{\beta}$ 不为零，则证明我们的模型是有偏差的。

¹¹ 这一安慰剂检验在相关文献中被广泛使用（比如 Chetty *et al.*, 2009; La Ferrara *et al.*, 201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安慰剂检验的结果是证明估计式无偏的必要非充分条件。换言之，在这一检验框架下，如果估计出 $\hat{\beta} \neq 0$ ，则证明估计式是有偏的；若得出 $\hat{\beta} = 0$ ，则能提供必要的证据，也无法完全充分证明估计式是无偏的。限于篇幅，该安慰剂检验的图未在正文中汇报，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表4 机制考察：经济社会发展影响的机制

	人均GDP	就业率	入学率
	(1)	(2)	(3)
OBOR×Post_2013	0.055*** (0.015)	0.033** (0.016)	0.040** (0.01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观测值	280	249	197
调整 R^2	0.997	0.836	0.979

注：结果变量为国家-年份层面的数据。

2. 误解与担忧的影响机制

其次，“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之一是由于海外媒体错误解读与渲染导致的误解、担忧与质疑。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广与相关项目的启动，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关注热度日益提高，各种讨论与争议也从未间断。不同国家、地区的媒体、专家从各自立场出发，对“一带一路”进行解读，出现了差异巨大的评议。例如，美国彭博资讯等海外媒体为“一带一路”贴上了中国版“马歇尔计划”的标签，由此加深了国际社会与沿线国家民众对于“一带一路”倡议的误解。¹²这些类似的误解、质疑与恐慌可能会降低中国的国家形象。为了验证这一机制，我们采用问卷中的两个问题：（1）你是否把中国视为合作伙伴？（2）你是否认为中国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霸国？如果“误解与担忧”的机制成立，相关国家的公众则会倾向于相信中国会成为超级霸国，不愿意将中国视为合作伙伴。回归结果在表5中汇报。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使得沿线国家人民倾向于相信中国终将会取代美国成为超级霸国，并且更倾向于将中国作为敌人而非合作伙伴。¹³综上所述，机制部分分析表明，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

¹² 部分海外媒体针对“一带一路”项目错误的解读与报道导致了民众对于该计划的误解。比如，2013年5月中国提出共同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倡议后，这一倡议得到了巴基斯坦政府的积极响应，但是巴基斯坦国内的部分媒体开始发出质疑与误导的声音，诸如，中国公司的大规模进入将会控制巴基斯坦的经济命脉；“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获益的只是中方等。诸如此类的质疑与宣传引发了民众对于相关项目的担忧与误解。

¹³ 表5列(1)“视中国为合作伙伴”这一变量的观测值较少，因为仅有2008、2009、2010和2013年四年的调查问卷包括此问题。若列(2)使用与列(1)相同的时间区间样本（即：2008、2009、2010、2013年的样本），结果依然是稳健的。

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与入学率；另一方面，在海外媒体不实报道与渲染的影响下，“一带一路”倡议加深了沿线国家对于中国的误解与担忧，从而降低了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

表 5 机制考察：对中国可能的误解与担忧

	视中国为合作伙伴	中国将替代美国， 成为超级大国
	(1)	(2)
OBOR \times Post_2013	-0.012 (0.010)	0.033*** (0.009)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观测值	48 151	67 514
调整 R^2	0.177	0.077

3. 影响维度分析

在此基础上，一个有趣的拓展性探索是，上述媒体的影响主要来自哪一个维度的海外媒体或政府报道，比如科技、政治、文化等。为了进一步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形象影响机制的维度与程度，我们进一步结合搜索指数进行影响维度的探索。具体而言，我们首先搜集了 2005—2015 年间 57 个国家的月度层面用以衡量政治、地方冲突、科技与文化的谷歌搜索指数，并将其平均到年度层面，从而构建了国家-年份层面的 5 个相关变量的谷歌搜索指数，其中包括：“政治”“政府”“冲突”“科技”“文化”。在此基础上构建了 4 个维度的指数：政治指数（包括“政治”“政府”指数），地方冲突指数（包括“冲突”），科技指数（包括“科技”），文化传播指数（包括“文化”）。其次，为了量化每一个维度的具体贡献大小，我们采用 Heckman *et al.* (2013) 和 Gelbach (2016) 的方法对其进行贡献量化分解：

$$Y_{ict} = \beta_1 + \beta_2 OBOR_c \times Post_{2013} + W'_{ict} \delta + X'_{ct} \varphi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4)$$

$$Y_{ict} = \delta_1 + \sum_m \delta_2^m \times Index_{mct} + \delta_3 OBOR_c \times Post_{2013} + W'_{ict} \delta \\ + X'_{ct} \varphi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5)$$

$$Index_{imct} = \varphi_1 + \varphi_2^m OBOR_c \times Post_{2013} + W'_{ict} \delta + X'_{ct} \varphi + \eta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 (6)$$

其中， c 表示国家， t 表示年份， m 表示维度（包括政治、冲突、科技与文化）；其他变量设定与主回归方程式一致。

Gelbach (2016) 证明：

$$\hat{\beta}_2 = \hat{\gamma} + \sum_m \hat{\delta}_2^m \hat{\varphi}_2^m.$$

表明，维度 m 所解释的效果为 $\hat{\delta}_2^m \hat{\varphi}_2^m$ ，剩下未解释的部分为 $\hat{\gamma}$ 。因此，维度 m 所解释的效果比重为 $\frac{\hat{\delta}_2^m \hat{\varphi}_2^m}{\hat{\beta}_2}$ 。

对应的量化结果在图 2 中汇报，结果表明：第一，在这四个维度中，政府、冲突与科技这三个维度的媒体报道通过“一带一路”倡议降低了国家形象。第二，量化分析结果表明，如图 2 所示，加总可得，政治维度带来的解释比重为 11.7% ($4.8\% + 6.9\%$)，地方冲突维度带来的解释比重为 6.1%，科技维度带来的解释比重为 7.2%，以上三方面共解释了 25% 的贡献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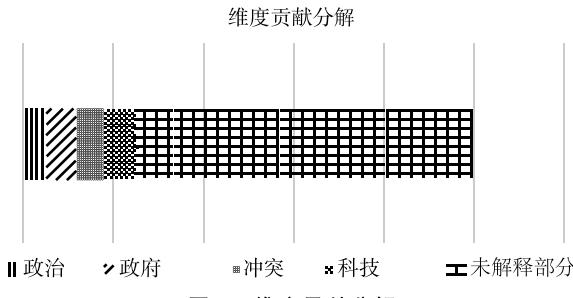


图 2 维度贡献分解

（二）异质性分析

“一带一路”倡议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自然禀赋不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社情民意差异巨大，系统全面地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大国形象的影响，不仅需要了解平均影响，也需要进行个体间、国家间异质性的研究。在这一小节，我们基于个人层面的特征与国家层面的特征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国家形象影响的异质性特征。

1. 个人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首先，我们基于个人层面的性别与年龄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在个人层面的异质性。相关回归结果在表 6 中汇报，列(1)–(2)汇报的是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组的回归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男性和女性均有显著的影响，且系数相似，在性别层面没有发现显著的异质性。列(3)–(5)汇报的是按照年龄分组的回归结果，不难发现，列(3)–(5)的估计系数具有显著的差异，列(3)的估计系数很小且不显著，表明“一带一路”对

于年轻人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几乎没有影响，列(5)系数达到了-0.410，表明“一带一路”倡议显著且大幅地降低了沿线国家老年人对于中国的评价。这一结果也与客观事实相一致，相比老年人，年轻人更容易接受新事物，包括新兴发展的经济体¹⁴，也更容易客观真实地评价相关经济体的发展；而年长的群体，由于思维相对封固，相对难以接受中国的快速崛起与发展，这一个人层面异质性分析的结果也与上述“误解与担忧”的传导机制相一致。

表 6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形象：个人层面异质性分析

	按性别分组		按年龄分组		
	女性	男性	30岁及以下	30—50岁	50岁及以上
	(1)	(2)	(3)	(4)	(5)
OBOR × Post_2013	-0.222*** (0.020)	-0.273*** (0.020)	-0.050 (0.052)	-0.267*** (0.053)	-0.410*** (0.061)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47 742	145 052	96 267	111 671	84 856
调整 R^2	0.196	0.189	0.173	0.200	0.198

2. 国家层面的异质性分析

接下来，我们基于国家层面的特征进行异质性考察。第一，根据收入水平，分为低收入与高收入水平国家，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影响在收入层面的异质性。¹⁵表 7 列(1)—(2)汇报了相关结果，发现虽然估计系数均显著为负，但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程度显著高于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这一发现也与上述机制的发现相一致，相比高收入国家，低收入国家更多地依赖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产品缺乏品牌效应与竞争优势，从这个角度来说，低收入国家的居民更容易将中国的人口红利、不断增长的人力资本红利、不断兴起的制造业视为抢夺其有限工作机会的威胁。

¹⁴ 由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原中国外文局对外传播研究中心）联合知名调查机构共同完成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 2016—2017》显示，相比年长群体，海外年轻人对中国内政外交表现评价更高，整体印象更好，对中国未来发展形势的看法也更为乐观。

¹⁵ 其中，低收入水平国家包括了按照 WDI 数据库中定义分类的“低收入国家”与“中低收入水平国家”；高收入国家包括了 WDI 数据库中分类的“高收入国家”与“中高收入水平国家”。

第二，我们基于国家的殖民历史考虑“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异质性影响。殖民主义对于国家的长远发展与公民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深远的影响。被殖民的经历可能会引导民众错误地将“一带一路”与曾经的殖民主义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搜集了数据库中各国被殖民的历史，基于自1800年起是否被殖民过的经历这一特征进行分组回归，表7列(3)—(4)汇报了相关结果，我们发现主要的负面影响来自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相反的，对于历史上未曾经历殖民侵略的国家而言，“一带一路”倡议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评价。这一结果也为上述机制分析提供了相关的佐证。

第三，我们根据国家地理位置考察“一带一路”倡议对于不同地区国家影响的异质性，相关结果在表7列(5)—(8)中汇报。不难发现，“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中东与中非地区以及南亚地区，尤其是南亚地区，估计值达到了-0.583，且在1%的水平上统计性显著，相反的，在欧洲与中亚地区，“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中国国家形象，表明其影响在国家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表7 “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形象：国家层面异质性分析

	国家收入水平分组		是否被殖民过		国家地理位置分组			
	低收入国家	高收入国家	曾经殖民地国家	未被殖民国家	东亚与太平洋地区	欧洲与中亚地区	中东与中非地区	南亚地区
	(1)	(2)	(3)	(4)	(5)	(6)	(7)	(8)
OBOR \times Post_2013	-0.304***	-0.157***	-0.318***	0.062	-0.219***	0.044***	-0.220***	-0.583***
	(0.015)	(0.009)	(0.110)	(0.101)	(0.021)	(0.017)	(0.026)	(0.028)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个人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国家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95 699	197 095	173 168	119 626	68 188	78 501	38 604	35 423
调整 R^2	0.183	0.186	0.203	0.124	0.305	0.119	0.111	0.321

(三) 进一步讨论：看似矛盾的事实？

上述分析结果展现了一个看似矛盾，实际却充满意义的事实：一方面，

“一带一路”倡议带来了沿线国家经济收入与就业率提高；另一方面，却带来了部分国家对中国国家形象评价的下降。如何解释这一看似矛盾的事实，这一现象又蕴含着怎样的经济学含义呢？对此，我们提出两方面的分析与解释：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沿线国家经济收入提高、就业机会增加是一个逐步深入、潜移默化的过程，可能无法被普通公众敏锐地捕捉到。即使公众感知到了本国就业机会与经济的发展，也未必会将此类经济社会的进步与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结合在一起。这一假设也与本节的异质性分析结果相一致：“一带一路”倡议对年轻人对于国家形象的评价几乎没有影响，而大多数负面影响来自中老年群体，相比年轻人，中老年人对于就业机会的变量、经济发展与创新的感知较为缓慢与不敏感，因此更容易忽视由“一带一路”倡议带来的经济社会水平的进步与变化。

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倡议过程中，国外媒体关于“中国威胁论”等相关词频的报道大量涌现，相比潜移默化的经济社会（如就业、教育水平）的进步，媒体报道给沿线国家人民的感知是更加直接与直观的；特别的，较为年长的群体，以及来自较为落后国家地区的群体，本身教育水平较低，也相对缺乏独立思考能力，更容易受到来自媒体宣传的影响，从而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与崛起更为敏感与担忧，降低其国家形象评价。因此，以上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家形象的提升一方面需要经济层面的投资以带动沿线国家经济社会的进步，另一方面也需要相关国家地区政府与海外媒体更为客观的报道和宣传。

六、结论性评述

40 多年的改革开放打开了我国对外开放的新局面，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制造大国、贸易大国和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一带一路”倡议是形成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格局的重大决策。如何在对外开放新局面下，有效地构建与提升国家形象，实现经济发展与国家形象提升的双赢，是一个重要且亟待得到回答的问题。实现对外开放与提升大国形象的双赢目标离不开对二者关系的系统把握，有赖于对“一带一路”建设对国家形象影响效应的科学评估。

鉴于此，本文系统考察了“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家形象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的主要结论是：第一，“一带一路”倡议显著地提高了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包括人均生产总值、就业率与入学率；但是却降低了中国在部分沿线国家的国家形象。第二，其负面影响可能来自部分海外媒体错误解读带来的“中国威胁论”，换言之，虽然“一带一路”倡议带动了沿线

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同时也引起了部分国家对于中国快速发展的误解与担忧，从而对“一带一路”产生了误解。第三，“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国家形象的负面影响主要来自年长群体，且具有显著的国别间异质性，负面影响主要来自低收入国家，历史上具有殖民经历的国家，以及中东与中非地区和南亚地区的国家。相反的，“一带一路”倡议对于年轻群体的形象评价并无显著影响，对于历史上未曾被殖民过的国家以及欧洲与中亚的公民的评价具有一定的正面影响。

本文的研究结果为相关贸易与产业政策的制定带来了新的启示。国家形象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带来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多重效益。“一带一路”倡议向世界传递中国和平发展、开放包容、与他国互利共赢的价值理念，是一个重要的构建国家形象的过程。本文的结果表明，一方面，“一带一路”相关政策的制定、项目的推行的过程，不仅需要考虑其可能的投资与经济效应，也需要将其对中国国家形象的影响纳入考虑框架，敦促海外媒体更加客观地报道和宣传这一倡议，传递出中国发展必须与世界共享的价值。另一方面，本文异质性分析的结果表明，历史上曾经被殖民过的国家，低收入国家，以及部分南亚国家的公民是对于“一带一路”倡议最为敏感的群体，倾向于将“一带一路”倡议与“中国威胁论”、霸国主义联系在一起。因此，在“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与推动的过程中，应特别注意这部分国家与地区，融通中国梦与沿线各国梦想，成就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共同愿景。

参 考 文 献

- [1] Acemoglu, D., D. Autor, D. Dorn, G. H. Hanson, and B. Price, “Import Competition and the Great US Employment Sag of the 2000s”,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 (S1), 141-198.
- [2] Autor, D. H., D. Dorn, and G. H. Hanson, “The China Shock: Learning from Labor-market Adjustment to Large Changes in Trade”, *Annual Review of Economics*, 2016, 8, 205-240.
- [3] 白重恩、钱震杰，“劳动收入份额决定因素：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世界经济》，2010年第12期，第3—27页。
- [4] Carrell, S. E., T. Maghakian, and J. E. West, “A’s from Zzzz’s? The Causal Effect of School Start Time on the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Adolescent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Economic Policy*, 2011, 3 (3), 62-81.
- [5] Chang, P. L., T. Fujii, and W. Jin, “Does ‘America First’ Help America? The Impact of Country Image on Exports and Welfare”, *Singapore Management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2017.
- [6] Chetty, R., A. Looney, and K. Kroft, “Salience and Taxation: Theory and Evidenc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9, 99 (4), 1145-1177.
- [7] Edmonds, E. V., N. Pavcnik, and P. Topalova, “Trade Adjustment and Human Capital Invest-

- ments: Evidence from Indian Tariff Reform”,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 (4), 42-75.
- [8] Fryer, R. G., and S. D. Levitt,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Gender Gap in Mathematics”,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0, 2 (2), 210-240.
- [9] Gelbach, J. B., “When Do Covariates Matter? And Which Ones, and How Much?”, *Journal of Labor Economics*, 2016, 34 (2), 509-543.
- [10] Gentzkow, M., and J. M. Shapiro, “Media Bias and Reputation”,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2006, 114 (2), 280-316.
- [11] Heckman, J., R. Pinto, and P. Savelyev,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an Influential Early Childhood Program Boosted Adult Outcom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 (6), 2052-2086.
- [12] 孔志国,“中国对非债务减免对国家形象的塑造”,《国际研究参考》,2017年第4期,第12—18页。
- [13] La Ferrara, E., A. Chong, and S. Duryea, “Soap Operas and Fertility: Evidence from Brazi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2012, 4 (4), 1-31.
- [14] Li, J., Y. Lu, H. Song, and H. Xie, “Long-term Impact of Trade Liberalization on Human Capital Formation”,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2019, 47 (4), 946-961.
- [15] 罗长远、李姝醒,“出口是否有助于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基于世界银行中国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金融研究》,2014年第9期,第1—17页。
- [16] 罗长远、智艳、王钊民,“中国出口的成本加成率效应:来自泰国的证据”,《世界经济》,2015年第8期,第107—131页。
- [17] Lu, Y., Z. Tao, and L. Zhu, “Identifying FDI Spillover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2017, 107, 75-90.
- [18] 毛其淋、盛斌,“贸易自由化,企业异质性与出口动态——来自中国微观企业数据的证据”,《管理世界》,2013年第3期,第48—65页。
- [19] 毛其淋、盛斌,“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入世’是否促进了出口参与?”,《经济学》(季刊),2014年第13卷第2期,第647—674页。
- [20] Moser, P., and A. Voena, “Compulsory Licensing: Evidence from the 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2, 102 (1), 396-427.
- [21] Pierce, J. R., and P. K. Schott, “The Surprisingly Swift Decline of US Manufacturing Employment”,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6a, 106 (7), 1632-1662.
- [22] Pierce, J. R., and P. K. Schott,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Mortality: Evidence from US Counties”,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2016b.
- [23] 盛斌、牛蕊,“贸易,劳动力需求弹性与就业风险:中国工业的经验研究”,《世界经济》,2009年第6期,第3—15页。
- [24] 田巍、余森杰,“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13年第1期,第28—44页。
- [25] 田巍、余森杰,“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和企业研发:基于中国数据的经验分析”,《世界经济》,2014年第6期,第90—112页。
- [26] 王珏,“‘中国经济威胁论’及其国家形象悖论”,《国际观察》,2007年第3期,第53—57页。
- [27] 魏浩、赵春明,“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财贸经济》,2012年第1期,

第 78—86 页。

- [28] 魏浩、付天,“中国货物进口贸易的消费者福利效应测算研究——基于产品层面大型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15卷第4期,第1683—1714页。
- [29] 徐旭伟,“‘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家形象塑造问题研究”,《声屏世界》,2016年第3期,第17—19页。
- [30] 余森杰,“中国的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企业生产率”,《经济研究》,2010年第12期,第97—110页。
- [31] 余森杰、李乐融,“贸易自由化与进口中间品质量升级——来自中国海关产品层面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6年第15卷第3期,第1011—1028页。
- [32] 余森杰、梁中华,“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管理世界》,2014年第7期,第22—31页。
- [33] 余森杰、袁东,“贸易自由化、加工贸易与成本加成——来自我国制造业企业的证据”,《管理世界》,2016年第9期,第33—43页。
- [34] 张川川,“‘中等教育陷阱’?——出口扩张,就业增长与个体教育决策”,《经济研究》,2015a年第12期,第115—127页。
- [35] 张川川,“出口对就业,工资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证据”,《经济学》(季刊),2015b年第14卷第4期,第1611—1630页。
- [36] Zhi, Y., D. Bao, and C. Luo, “Economic Value of Country Image: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17, 25 (3), 87-111.

The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Image in the New Framework of China's Openness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NG SONG CHANGYUAN LUO*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and Economics)

YAXIN LI

(Toulouse School of Economics)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amines the effect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on construction of country image of China. The authors have two main findings: Firs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substantially increases other countries' social-economic development. Second,

* Corresponding Author: Changyuan Luo, School of Economics, Fudan University, Guoquan Road 600, Shanghai, 200433, China; Tel: 86-21-65643708; E-mail: chyluo@fudan.edu.cn.

its impact on country image is heterogeneous; it raises the country images of European and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and reduces the country images of some low-income countries and South Asian countries. The major channels are likely to be from overseas media's misunderstanding and report. This research provides policy implication for improving country image in the new framework of international trade.

Key Words trade and opennes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ountry image

JEL Classification F10, F13, R10